

邓小平到江油

罗 昌 文

1958 年 10 月 17 日,邓小平总书记到了江油。

当时,我是江油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那天早晨,县委书记苗满山向我说,今天有重要客人来,他要到马角坝去等候,要我去请县长白光亮过来。说完,就与杨后楷等人步行去了火车站。

上午 10 点左右,县委院内来了四辆小卧车。当时整个江油没有一辆汽车,后来知道这些车是火车上运来的。那时的县委机关设在旧时的火神庙内(现党校),后院是撤去菩萨留下的圆柱大厅,用来开大会。前院有个大坝子,两边是长长的厢房,县委各部门全在这些厢房中办公。县委办公室在东厢房,只有我和杨后楷主任两人,他经常列席县委常委会或与书记下乡。我在办公室管印章,处理文书档案、来信来访,还要承担接待应酬。

院里来了这么多小汽车,大家都很好奇,纷纷探头张望。我到唯一的县委小会议室兼接待室去等候。这个会议室在大院左前边的旧时涪源公司小院内,中间隔了一排横厢房。我等了几分钟,未见客人进来,就往前院走,看见了白光亮正和几位车上下来的人站着交谈。白见我吩咐说:“你去给上面来的客人带个路,到武都。”

我被安排在最前面一辆车上,坐在前排驾驶员旁边,后排坐着

两位大个子中年人。上车后，他们不住地提问，见山问山名，过一处地方问地名，还问了我是在干什么的。我感觉出，他们好像是警卫或秘书人员，似有审查我的意思，但态度和语气都很诚恳友善。

那年秋天雨水特别多，大雨刚停，公路上遍是泥泞。三台县委书记王德立率领的十万民工在武都一带大办钢铁，江油当地的青壮年农民也都上了钢铁前线。公路上走着牵线的人流，有背包扛行李的，有抬树子的，有运矿石的。汽车开得很慢，我隔着玻璃向外看，人们脸上多有好奇或惊愕的神色。即使泥浆溅到身上，也都笑着跑开，很少有怨愤之意。

车过岩嘴头，后面一位像是警卫的同志给我发话：“到一个能看见武都水库的地方停车。”

不一会，到了七里坡。我说：“这里最好看武都水库。”我坐的那辆车停在了坡顶靠前的位置，后面几辆车也跟着缓缓停下。我在此前从未见过小卧车，坐汽车更是头一回。车停了，不知道怎么开车门，只好坐着不动。后面那位像警卫的大个子先下了车，走到前面拉开车门叫我下来，并示意要我站在车边，不要跟着首长去。后面几辆车上的人下车后，就往右边的缓坡上走去，到一个稍高的小平台上停下了。他们面向北面的武都方向，有说有笑，还不时比划着。相距我站的地方至少在 30 米以上，他们说些什么，我都未听见。警卫和秘书与我站在一起，继续问这问那。正说话间，前面一位穿银灰色中山服的大个子向我招手：“小鬼，你过来一下。”我认出，他是西南局、四川省委书记阎秀峰（当时李井泉是第一书记，其余都称书记）。那段时间，他常在江油。我疾步走到他面前。那时我虽已二十出头，也接待过省、市领导，但在这么多中央领导面前还是显得很拘谨，连环视一下的勇气都没有。不知是哪位领导问我前面的山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左边的叫观雾山，右边的叫窦圉山。”有一位操北方口音的大个子领导指着南塔后面，在向其他人介绍武都水库的大坝位置。这段涪江被南塔坡挡住了，看不见江

面。这时,有人问我:“那一带的农民烧不烧石灰?”我回答:“那一带历来就有人在烧石灰。”好我是在那一带长大的,江边的石龙嘴、观音岩、二十四个癞蛤蟆朝圖山、青岗扁等奇形怪石,我小时候都去爬过。我正在心里高兴未被他们问住时,听到一个四川口音说:“漏水的问题好不好解决?”这时,我才抬头认真看了那人一眼,顿时反应过来——这不是邓小平吗!在那个年代,人们除了从挂像上认得毛主席外,对其他中央领导的形象都不太熟悉。中央“八大”会议后,按照上级的要求,县委会议室挂出了毛、刘、周、朱、陈、林、邓的头像。在看电影时,放映正片前,一般要加映点新闻纪录片,我是从那里面知道一些中央领导模样的。

那位操北方口音的领导继续给小平总书记介绍情况,话中有不少专业术语,加上口音不熟悉,我听得似懂非懂。但是他话中多次说到喀斯特这个词我听懂了。因为我曾经读过《徐霞客游记》,知道喀斯特就是石灰岩溶,是形成溶洞的地质结构。这时,我才明白了他们问我烧不烧石灰的原由。

小平在听那位专家讲解时,眼睛始终盯着脚下城塘、阳亭两块坝子,不时抬头看看观雾山和窠圖山,看着从两山之间流出来的涪江凝神沉思。在那位专家讲解完后,小平总书记说了一句:“这么好的坝子占了太可惜。”随即转身就往坡下走,其他人也跟着往回走。秀峰书记示意我朝后退让,等他们都上了车,我才与警卫、秘书上车,继续向武都方向进发。

那以后,小平总书记再也没到过江油,水利部长钱正英却多次来过。我们听说武都水库不修了,在石龙嘴、观音岩一带涪江上搞了几年地质钻探的机械设备也撤走了。若干年后,武都水库的设计方案变成了武都引水工程,小平同志在接见外宾时,多次把它称为‘第二个都江堰’,武引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大大提高。我想,他的宏伟构思也许就是在那时形成的吧!

上车后,警卫告诉我,要去看看大炼钢铁。当时的公路只能通

到武都街上，但我知道钢铁民工正在修筑通往观雾山矿区的公路，便指引驾驶员出北门，到了公子坪。这里是三台县钢铁大军的战场，到处是土高炉，运树子、运矿石的民工川流不息。汽车在一片密集的土高炉附近停下了，几辆车上的人陪同小平同志往前走，警卫仍示意我在车旁等着。武都钢铁指挥部指挥长王德立也赶来了，陪着他们走走停停，边交谈、边比划。没过几分钟，就叫往回走。

回到武都街上，我坐的车刚到水巷子前面的供销社附近，警卫叫停车。回头看，后面几辆车先停下了，离我们有一段距离。街左边有条长长的巷子，不过一二米宽，那是通往区委的唯一通道，汽车开不进去。区委第一书记白宇清和副书记刘禹九站在巷子外面的街上等候，秀峰书记和后面那辆车上的几位领导下车与他们交谈了一会，小平没有下车。刘禹九看见我在前面站着，就走过来搭话。他神秘地说：“总书记问起粮食问题，我们粮站的大米只够吃三天了。”这时候，身后有位小媳妇模样的女同志悄悄叫他：“刘书记，是不是毛主席来了！”刘厉声斥责：“莫乱说，不是得。”小媳妇吓得伸了下舌头，做了个鬼脸，跑开了。

正说着，后面那辆车开动了，从我身边过去，后队变成了前队。警卫招呼我上车，我们尾随着跟了上去。回到中坝，我在纪念碑前下车。车队往大河坝涪江边上开去，过渡去了火车站。

后来，听苗满山书记讲，小平同志原计划到澄水看大炼钢铁。那天早晨，彭华（绵阳地委第二书记）急令苗满山赶到马角坝抢修一座便桥。苗满山组织了 200 多人搬运石头、砂子，修好时已午后了。小平同志的专列经过马角坝火车站，没有停，直接去了广元。

转瞬已经过去四十四年，小平总书记到江油的音容笑貌，我至今清晰在目，终身难忘。没想到，他老人家那句简短而随和的话，竟然催生出了一个武都引水工程。现在回味起他那高瞻远瞩的智慧决策，不禁使人肃然起敬。

回忆李林枝同志

羊 重 海

李林枝同志是原绵阳地区地委书记，是一个受人尊敬和爱戴的老领导。解放后李林枝同志是遂宁专区的地委书记，五十年代初期我一直在遂宁专署财委、统计科、计划科从事计划统计工作。1956年，林枝同志研究如何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 800 斤的问题时，我和他有过一些交往，他那种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事业心，对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的高度责任心，尤其是一个领导干部能够那样脚踏实地、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记得是在遂宁地委常委会议室我第一次参加了由林枝同志主持研究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如何达到 800 斤的问题，参加会议有部分常委、专署领导和专区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我是唯一作为工作人员跟专署统计科长郭升元同志一道参加会议的。当时《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未正式公布，先是毛主席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个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交换了意见，共同商定“十七条”，随后又把“十七条”发给各地征求意见。1956年1月上旬党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

过。农业发展纲要的中心任务是要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迅速提高农作物产量。规定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 1955 年的 150 多斤增加到 400 斤 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 1955 年的 208 斤增加到 500 斤 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 1955 年的 400 斤增加到 800 斤。农业发展纲要还对棉花产量和农村其他生产、科技、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工作都作了规定。遂宁专区是属于要求达到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 500 斤的地区，林枝同志讲了中央文件精神之后，让大家讨论提出贯彻意见，中心是如何提前实现 800 斤的问题。当时，这确实是一个新问题，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我国还没有长期规划，《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算是我国最早的长期规划，专区一级乍然讨论长远设想自然是陌生的。而那时的情况是农村土地改革后，生产力得到彻底解放，农业生产得到了空前的恢复和发展。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已经达到 400 多斤；另一方面，遂宁专区是个丘陵地区，土质贫脊，水利设施主要依靠为数不多的塘堰，肥料则依靠养猪积肥，全区还没有一个化肥厂，生产条件限制着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因此到会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自然感到压力很大，每亩耕地平均年产粮食要再大幅度增长，以致翻一番谈何容易，在讨论中一时难以提出系统的办法，有的觉得现在产量已经很高，有的也讲生产条件太差。这样讨论来讨论去半天提不出提高粮食亩产水平的办法来，到会的同志难免感到尴尬，林枝同志也有些恼火，议论中难免有些批评之词。我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由于年轻人的热情而无所顾忌，因为按说我这个小科员并没有资格在这里发言。趁大家挨了批评冷场之时，我轻声地说，我大体估算了一下（五十年代还没有计算器，开会带算盘不方便，我用计算尺估算，只有三位数是准确的），1955 年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已达到 400 多斤，差点的县如盐亭也已达 300 多斤，比 1949 年增加 150 多斤，比 1952 年增加 80—100 斤左右，从粮食增长的规律来看我觉得只要逐步改变

生产条件,兴修水利,改田改土,改良耕作技术,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是可以实现 800 斤的。比如多搞复种,增加复种指数就是提高每亩耕地粮食年产量的有效办法。林枝同志听了我的简短发言后颇感兴趣,对大家说:我看还是有人动脑筋,研究问题就是要动脑筋。不要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不要光强调困难,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嘛。

林枝同志对领导干部一向要求严格,他的威望高,又服众,他召集会议时各部门的领导干部都十分谨慎。但他对年轻同志十分爱护和鼓励,有时甚至表现出宽容。我记得因为工作关系,我对全区的一些经济数据记得较熟,比如耕地面积,人口总数、粮食产量、生猪头数、购买力总额等等,都能随口说出,所以地委研究经济问题,领导参加会议便叫我一道去,像是作个助手。林枝同志研究问题爱算帐,爱问数字,有些经济部门的领导汇报时数字搞不清楚是要挨批评的,有时批评得很利害。我一般的大数字虽然记得熟,有时搞忙了也有说错的时候,可林枝同志发现后他还笑着说,你没弄清楚,弄清楚了再说嘛。那时工作效率很高,他研究问题一般是要决策的,不是议而不决,他那种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是难得的。

隔了两三天后,地委办公室通知叫我把历年的统计资料和算盘带到林枝同志办公室去算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的帐,我知道这又是为过《农纲》的事了。到了他的办公室一看,他正坐在那里等着,原先我以为还有其他同志,结果是书记和我算帐。他说我们来计算一下,看要多少年、多大的增长速度才能实现粮食亩产 800 斤的规划。这种算法很复杂,不像现在用计算机那么简单,首先要假设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再用速度乘基数的总产量,后用总产量除耕地面积求每亩耕地平均年产量,这种算法都得用算盘来打,还得用平均增长速度一年一年地算给他看,这样他才放心,所以算一个速度的产量要费许多时间,那时我的算盘打得又快又准,他定了速度后我就打算盘,他的办公室在一楼一底的楼上,空荡荡的一间房

子，院子里绿树成荫，更显得静悄悄的，只听得霹啦啪啦一阵一阵的算盘响，等我一阵算完之后他再斟酌，那时的生产水平还低，粮食产量 1950 年到 1952 年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只有 8%，1953 年到 1956 年只有 6%，高了又算低，低了又算高，五年算下来不行又算七年，就这样反反复复地他作规划，我来计算，我们也互相交换意见，中间也不休息，半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头天没算完，第二天又接着再来。林枝同志是个老红军，老领导，他一贯忠于党的事业，忠于毛泽东思想，他又很熟悉农业，对中央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非常重视，遂宁专区又是一个农业区，他认为这是发展农业的重大事情，所以不愿假手于秘书或工作人员，这种重大事情领导亲自动手的认真精神，实在值得现今各级领导效法。

林枝同志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这是他的一贯作风，各地的社队干部以及许多农民都熟悉他，有什么事情都要跟他讲。碰着农民插秧，怕耽误群众的时间，就跳下水田和农民一起插秧，他的农活很熟，能插得一手又快又直的好秧。有一次叫我跟他出差，我知道这又和跨《农纲》过 800 斤有关。从遂宁到蓬莱镇，坐一辆吉普车，他随身有一个工作人员，加上我和司机一行四人，路程不过四、五十公里，可是上午九、十点钟出发，直到下午五、六点钟才到达目的地。吉普车在碎石路上颠簸前进，沿途见有一块坝地，走不到一会他叫下车，带着我们直奔田间，生产队长和农民都热情地招呼李书记，于是开始了调查研究，他蹲在田坎上一边问，农民在地里一边干活一边答，我们就站着一边听，一边作记录，从今年的亩产粮食多少斤，明年可以达到多少，从改田改土、养猪积肥、兴修水利到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购买化肥农药等，从农业生产、收益分配到群众生活诸多方面，林枝同志非常熟悉农事，又了解群众，他能抓住要点，单刀直入，提问深入浅出，回答起来也很简便，三下两下就把情况弄清楚了，然后和乡亲们挥手告别，上车继续前进。没走多久来到一带丘陵地，土多田少，又叫下车，我们跟着他又往田间找

乡亲们说话，那时的社队干部都和社员一起劳动，在调查中干部也讲，群众也讲，容易听到真实情况。问生产情况时干部讲得多，问生产和生活有什么困难时群众抢着说话。李书记和他们商量如何把当前生产搞好，困难慢慢解决。那时解决基层问题比较方便，比如农贷发放、化肥供应，我们记录下来给乡上、区上说下就解决了。后来又走了两个生产队，主要了解改田改土，扩大粮食和棉花播种面积和提高亩产水平的问题。五十年代地区的工作主要是抓农业，专县两级的干部要常年抽调一批下基层，区乡的干部都分片包干成天在农村跑，区、乡政府除了值班守电话的外，一般是没有人坐机关的，这大约和当时的领导作风有关。所以我们一路也只有直接到生产队作田间调查。短短的路程，如此走走停停，三番五次地到田间调查，当我们到达蓬莱镇时已经夕阳西下了。镇委早接到通知李书记要来，准备的菜饭已经热了几次，当林枝同志还在和镇委的同志说话，我们看到几样小菜和一盆干饭时早已饥肠辘辘，馋涎欲滴了，我们两个小伙子 and 司机一齐抓起碗筷，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因为这天算是午饭晚饭一起吃了。

绵阳、遂宁两专区合并后没有好久林枝同志调省上工作，我们再也没有见面。我后来见到他大约是 1967 年‘文化大革命’中绵阳的造反派把他从成都揪来在人民公园广场（即现在的文化广场）批斗走资派时，他那时大约五十多岁，显得十分于心不忍，李林枝这个人谁人不知？但是在那个年代谁又有什么办法。批斗后把他弄到专署食堂厨房里吃饭，炊事员李辉武、邓卓良、贾宗国他们都知道李林枝是个好领导，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背着人拿一个大土碗把肉盛在下面，上面盖上半米饭，表面上看是一碗没菜的饭，而且故作凶相又暗递眼色地吼道：走资派老实点，在那边屋角角边去吃！真有点像电影里革命群众掩护共产党领导的样子。

林枝同志虽然离开绵阳几十年了，但是许多同志、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老同志依然怀念着他。

忆郭诚同志二三事

——纪念郭诚同志逝世十八周年

江瑞炯 杨朝俊

郭诚同志，男性，汉族，小学文化，山西省沁源县正中村人。1923年12月10日生，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任沁源县一区区委组织委员、民兵连指导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调任运城区（县级区）区委书记、土改工作团团长。1949年10月，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南下工作团。随军解放四川后，任罗江县公安局局长。1950年10月，调任绵阳县公安局局长，1952年任绵阳县县长，1956年后任县委副书记、代理书记；“文化大革命”后任中共县级绵阳市顾问。1984年1月15日病逝，享年62岁。

郭诚同志在绵阳县工作期间，深入实际，平易近人，为人民群众办了大量实事，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支持。现就本文笔者之一的杨朝俊亲历的二三事整理成文，以纪念郭诚同志逝世十八周年。

组织人民支援宝成铁路建设

1952年6月1日,天成铁路(后因此路与陇海铁路接轨入由甘肃天水改为陕西宝鸡,此路也改称宝成铁路)绵阳县境段开工,郭诚同志担任天成铁路绵阳县筑路委员会主任,负责完成绵阳县境征地搬迁、动员民工、派送枕木等支援铁路建设任务。为了做好这些工作,顺利完成任务,郭诚同志不辞辛劳,走遍全县各乡镇,亲自动员和督促检查完成任务的情况。东宣乡位于距离县城40多公里,与梓潼县交界处,当时不通公路,交通很不方便。郭诚同志步行前往检查分派500根枕木(共200多平方米)的落实情况,时任东宣乡青年团支部书记、农民武装队长的杨朝俊参加了接待。在这次检查期间,郭诚同志还向杨朝俊同志交办了一封人民来信。信中控告东宣乡人民政府一名干部同他人妻子通奸,要求县人民政府处理这名干部。郭诚同志要求杨朝俊查清事实向县政府报告。后来这名干部受到了纪律处分。写信农民到处说:“人民政府真是人民的政府。”我写的一封信,在县长亲自过问下,搬倒了一名乡干部。”

救济公共食堂断炊

1959年,绵阳县在大刮“浮夸风”时又遇到严重的旱涝灾害。从3月到7月,全县16万亩农田缺水、1.8万亩秧田龟裂、13万亩稻田秧苗枯死、45550亩粮食颗粒无收。到了8月又出现暴雨,江河河水猛涨,全县40多个乡镇、48600亩农田被淹,洪水冲毁水利工程514处,冲走牲畜340头,农房倒塌830多间,死亡3人,全县

500 多个公共食堂基本上断炊。1959 年年底，县委决定由县人委拨款 9.2 万元救济灾民，并责成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崔映乾同志，带领工作组深入全县公社公共食堂，安排好群众生活。

1960 年初春，县委派出以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胡逢源为组长，团县委书记杨朝俊为副组长的县委工作组到青义区开展调查研究，重点救济困难群众。工作组经过调查发现：造成公共食堂断炊的原因，除自然灾害外，人为因素也是很严重的。如石马公社系县境土地、水利资源条件较好的公社之一。全公社 4000 多个男女劳动力，除去到旺苍炼钢的 800 多人外，留在公社的 3000 多劳力约有一半人得了水肿病，1959 年下半年以后，因水肿病死亡人数在 100 人以上，几乎天天都有水肿病死亡的情况向工作组报告。工作组在公共食堂吃饭发现，4 个大公共食堂人均日分配口粮不足 0.25 公斤。查阅公社管委会的年报表：1959 年全公社实产稻谷 40 万余公斤，在‘浮夸风’影响下，上报成 60 万余公斤，因此在向国家缴纳征购粮后，农民口粮严重不足，每天只好以马苕和 3 至 5 两（16 两为 1 市斤的旧秤）稻谷粉供社员充饥，不仅营养严重缺乏，而且还不能吃饱。明知水肿病是口粮不足造成的，公社干部硬说病因不明。工作组在公共食堂吃饭，同样无法吃饱，饥饿难忍时，得到公社党委书记送来的几根红甘蔗（果蔗）充饥。工作组目睹社员饥饿时将自养鸡儿杀死煮熟连骨带肉一起吃下的情况，欲救无力，心里非常难过。

恰在这时，中共绵阳地委常委、宣传部长吴儒玢到绵阳市石马公社作调查。工作组向她汇报实情时大胆提出了三条农民的救命方案：（1）向县委汇报真实情况，要求从石马公社缴纳的征购粮中退回 10 万公斤，以解决社员口粮不足问题，保证每人每天有 0.5 公斤口粮。（2）请县人委责成卫生部门派出 5 至 10 名医生到石马公社抢救水肿病重危病人。（3）追究石马公社‘浮夸风’的制造者、公社党委书记 × × × 的责任，并通报全县以教育广大干部。此 3 条

吴部长均表同意,要求迅速办理。

1960年2月底,中共绵阳县委召开常委会议,会议由郭诚副书记主持,青义区县委工作组副组长杨朝俊列席会议并汇报了石马公社实情和解决方案,得到会议的认可。会后,石马公社集中全公社水肿病危重病人1200余人入住公社肿病医院,由专区和县卫生部门派出的医生安排生活,每天发给每个病人康复丸(肿病医院用黄豆面、细米糠加红糖、猪油制作的)3颗,病人伙食每日3餐均为肉稀饭;公社干部负责组织物资供应和后勤工作。不到1个月,1200多名水肿病危重病人全部康复。

带领县委机关干部到公社当社员

1960年春,为了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和生产上的瞎指挥,郭诚副书记根据上级党委指示,带领绵阳县级机关各部门李玉玺、刘掌元、曾淑君、杨朝俊等领导干部30余人,深入梓绵公社二大队当社员,与公社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一段时间实践,大家发现过去瞎指挥生产造成很多弊端:如深挖土地,小麦密植,办公共食堂等等。深挖土地挖乱了土层和破坏了土壤结构;小麦密植造成倒伏减产;特别是办公共食堂砍树作柴烧破坏了森林,强迫男女老少人人都要在公共食堂吃饭,后因口粮严重不足,导致水肿病流行,经常死人等问题急待解决。大家要求县委不要再喊“人民公社是天堂,公共食堂是心脏”等错误口号;农田种植如何进行?每亩下多少种?森林如何保护?生活如何安排?这类问题均应当由农民自己决定,不能把农民管得太死!在郭诚书记主持的一次讨论会上,大家踊跃发言,郭诚书记耐心听取,认真记录。但因涉及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否正确的问题,哪个领导当时也不敢表态。由于郭诚书记理解干部心情,坚持实事求是,跟

随他到农村当社员的县级各部门 30 多名领导干部，没有一名被反“左倾”。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简称“七千人大会”),中共绵阳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崔映乾同志等代表绵阳市出席会议。会议精神：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更加坚决地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为尽快战胜国民经济困难而斗争。为了贯彻会议精神，中共绵阳县委同全国各地一样，采取社员家庭包工包产，允许社员种少量自留地、逐步开放自由市场（公共食堂已于 1961 年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后解散)等措施,使得国民经济很快好转,市场商品供应明显缓和。1962 年，全国人均粮食消费比 1961 年增加 5.5 公斤、猪肉增加 0.8 公斤、棉布增加 0.83 米。

怀念新中国安县首任 县长赵鸿图

陈 永 奎

敬爱的赵鸿图县长，是新中国建立后，领导安县人民脱离苦海，爬出深渊，跃出火坑，摆脱贫困，开始走向阳光大道的指路明灯——第一任县长。

安县人民在解放前和全国人民一样，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世代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走投无路的艰险危难境地，真是欲生不能，欲死不得，全被那些如狼似虎的地主恶霸、封建把头、土豪劣绅、无恶不作的魔鬼，堵死了广大劳苦群众的求生之路。多少人无地种、无田耕、无房住，多少人无衣穿、无饭吃、无工做，多少老小无人管，多少孩童无书读，一切人权被剥夺，一切自由全丧尽。完全是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话无处说，有冤无处申，祖祖辈辈做牛马，子子孙孙受人欺的极端难忍的黑暗社会。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亲自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和全国人民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分别于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到达绵阳，赵县长也于31日下午奉命赶到安县花菱，1月1日抵达安县县城，很快接管了旧政

权,1月2日正式向全县人民郑重宣布:“**安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从此,安县人民亲眼看到了赵县长在布告中宣布的党在新区工作的《约法三章》的各项政策,告示指引各界人士照常生产,照常工作。随即人心安定,生活平静、生产、工作很快地稳步前进。

赵县长真正是党派来的安县人民的父母官,一来到安县就和劳动群众生活在一起,衣着俭朴,生活艰苦,工作繁重,在全县人民的心目中树起了一个人民公仆的伟大形象。因此赵县长所发出的各种号召,宣布的各条政策,所作的每条指示,布置的各项工作,下达的各项任务,全县所有的工作干部,人民群众,都是热烈拥护,积极响应,坚决贯彻执行,千方百计地争取提前完成。

那时,赵县长派来的武装工作队,在安县地区工作的同志,专门来到高桥,而且王筱斋、刘隐侠、李芝明等同志常住我家,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工作。他们日以继夜也深入群众,了解地方风土民情,宣传党的政策,采取多种方式,召开各种座谈会,使党的方针政策在群众中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不管男女老少都对工作队的同志产生了好感,加深了了解认识,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了明确的认识和真诚的信任,逐步建立起了党和人民及人民群众和党和政府和军队之间不可分割的鱼水深情。所以从1950年1月至4月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顺利地完成了党和政府下达的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征粮工作、春耕生产等几项重要任务。

通过赵县长4月份在桑枣镇亲自主持召开的以贫雇农为主体,有青年知识分子参加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将党在新区开展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具体措施,给到会代表讲得一清二楚,我和所有的到会代表都聚精会神地亲耳聆听了赵县长的报告,领会了报告的全部内容和精神,会议中对报告进行了认真深入地逐项逐条地全面讨论,回区后又参加了各级组织召开的群众诉苦大会,通过“吐苦水、挖穷根”,大大地激发了广大劳苦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随即分村建立了农民协会。当地原地下党支

部书记——革命烈士陈永安的胞弟陈永志，被推选担任了安昌镇高安村第一届农民协会主任，贫雇农代表陈定海、陈永旺先后担任了该村村长，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掌握了人民政权，使广大贫下中农扬眉吐气，得到了彻底翻身和解放。5月下旬的一天，工作队在桅杆院子后山（现石梯六组）大松林里所召集的高安、金龟、石梯、建国四村联合召开的“宽严大会”上，由赵县长派来的武装工作队负责同志，在群众大会上按照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联系当地实际工作情况，作了深入细致、全面具体的工作报告，将党的方针政策，向到会群众宣传讲解得非常具体明白，让群众都达到深入透彻的理解。当天一些曾经参加过土匪活动的农民，都主动地争取在大会上向大家坦白交代了各自的罪恶活动 and 不法行为，决心悔过自新，改恶向善，努力生产，好好作人，得到了群众的谅解，党和政府的宽大，95%以上的胁从人员都被宽大处理，回到了自己的家庭，积极地和农民弟兄共同生产劳动，变工互助，发挥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创造了农业丰收的有利条件。广大群众无限感激党和人民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和爱护。

地下党员陈永安于1930年冬，因参加合川兵变失败，同妻子彭氏（红军）回到安县高桥老家从事农业生产，听候组织安排，于1933年2月建立高桥支部，任支部书记7月建立游击队任队长，因筹集地下武装资金，准备兵变起义，不料10月12日被安县保卫团第一大队大队长杨茂轩唆使保卫团小队长李孝全暗杀于月堂庵（现安昌镇川主村）渡口，陈永安壮烈牺牲。从此十余年沉冤莫白，家人、族人受害。赵县长一来到安县，就在各方面工作人员配合下，很快的将事件查清，为了寄托人们的哀思，还将他家所在的村命名为高安村，以表纪念。并于1950年8月，将首犯杨茂轩依法处决。为陈永安烈士报了仇，为人民雪了恨，为当时所有的农协会会员、积极分子及陈永安烈士的全家祖孙三代申了冤，凡听到这一大快人心的喜讯的父老乡亲，莫不拍手称快，同声赞扬赵县长为民除害的伟大